

聞述組織政軍反動幫蔣



(內部讀物)

群眾出版社

蔣幫反动軍政組織述聞

本社編

(內部讀物)

群眾出版社

1962年11月

出版說明

这里收集的有關復興社，C. C，交警总队，青年軍等蔣幫反动軍政組織情况的六篇資料，原載“文史資料选輯”，現印出供政法公安系統內部閱讀參考。这些資料中所列举的事实，都沒有經過查对，希讀者在參考和引用时加以注意。

1962 年 8 月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 14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0 号

*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175(社)36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2/16$

1962 年 11 月第 1 版 196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87 千字 定价(4) 0.41 元

目 录

黄埔同学会始末	(1)
复兴社述略	(24)
“中央俱乐部”——C. C 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	(78)
C C 外围组织诚社始末	(93)
“交通警察总队”是一支什么样的反动部队	(114)
蒋经国与青年军	(117)

黃埔同學會始末

一、黃埔同學會的前期

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成立

黃埔軍校，于一九二四年二月起，在廣州、上海等地招考第一期學生，四月初入校受入伍訓練，六月十六日正式開學。不到兩個月，第一隊的共產黨員學生蔣先雲即與在粵的粵、桂、湘、滇各軍所設立的軍官學校的學生聯繫，醞釀“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組織，并向黃埔軍校建議成立這個組織，意在以革命的黃埔學生，來影響各軍官學校的學生，以免成為各軍在廣東爭奪地盤、各霸一方的罪惡工具。這個建議，不僅為全體黃埔同學所贊同，而且還得到了蔣介石的特許。當即推蔣先雲為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籌備員，我亦在被推之列。蔣介石曾親筆寫了一篇發起這個組織的序言，說明成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革命意義。

在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快要畢業的時候，即一九二四年十月左右，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組織已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加之軍校第二期的共產黨員同學周逸群、王一飛等的積極活動，

在大多数的青年軍人中，树立了相当的威信。在第一次东征前，即一九二五年一月間，就发展到了相当的人数成为比較有力量的組織，能在广东的青年軍人中起着領導作用了。

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

黃埔軍校开学时，国民党的老頑固分子謝持由上海来广州，說是参加軍校开学典礼，他住广州大沙头医院，節詞养病，极力拉攏軍校教職員中的右翼分子，如教授部主任王柏齡等以及学生賀衷寒、潘佑强、冷欣等。极尽造謠煽动的能事，說：“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黃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等等，危言聳听，激起了上述諸人对共产党员同学的仇視。后来又感到蔣先云、周逸群等在学校內公开散发《向导》周报和其他宣傳共产主义的刊物，而他們又都是青年軍人联合会的核心分子。就断定青年軍人联合会这个組織不是一般青年軍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組織的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組織对付組織的行动。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在这样情势之下，专为对付青年軍人联合会而起，并不是为了要学什么孙文主义，所以一經发动起来，就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员同学惹事生非，寻衅肇禍；种种蛮不讲理的情形，真是举不胜举。其最为突出的一件事：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潘佑强、楊引之两人，某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內，遇到青年軍人联合会的負責同学（是否周逸群、王飞，已記不起了），即辱罵不休，施以毒打；而他們自己亦遭到了回击，彼此都受了伤。于是潘、楊两人的打

手之名，就傳遍了廣州。我為此恐涉及共產黨的嫌疑，宣布脫離青年軍人聯合會的關係，但亦沒有參加孫文主義學會的活動。這不等於我不反共，不過我的反共行為，不象潘楊兩人那樣張牙舞爪罷了。

這些反共分子，不僅在於吵吵鬧鬧、惹事生非了事；其最終的目的則是在於把共產黨員完全排除出國民黨以外，從根本上破壞革命的三大政策，故不惜進行種種陰謀，製造事件，以激起蔣介石發動反共的決心。本來早已蓄謀反共的蔣介石，有了這些人的興風鼓浪，搖旗吶喊，更有機可乘，而同這些人上下其手，轰动一時的中山艦事變，就是在這樣的陰謀中製造起來的。但蔣介石却裝作不知的樣子，於事變後不久，召集我們在黃埔同學中一部分負責人，在廣州長堤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聚餐時，只說明：中山艦事變是由于他在事變前，由黃埔乘汽艇來到廣州東山住所，剛一坐下，即有人打電話來問：“校長今天返不返黃埔？”他答說：“要返黃埔。”不一會兒又來電話問：“校長何時動身返黃埔？”他頓時感到：象這樣向他打電話的情形，還是第一次，因而疑有異狀，便答：“返不返黃埔現尚未決定”。隨即派人偵察情況，見中山艦已自動地升火待發，同時工人糾察隊亦有整裝出動的情形，即判定中山艦將乘他登艇返黃埔之時，攔截他到艦上，送往異地加以謀害，以事起倉卒，故權宜處置云云。我等問：“打電話的究竟是那一個人？”他說：“沒有到死的時候，不願把這個人公開。”我等當時聽了他這番講述後，就信以為中山艦事變，是突然發生的事情，決不是有人製造起來的。但至今想起來，他當時不願把打電話的人公開出來，根本沒有什麼打電話的人，純是蓄謀反共的捏造。

蔣介石不仅欺騙我等，就是对那些造謠煽动、惟恐不发生事变；而投合了他的意图的人如王柏齡等，也不承认中山舰事变，是由他們所煽动而起，而且还作出譴責他們的恣态，給予他們免职处分。这不仅是为了杜絕王柏齡等向他邀功求賞，甚至乘机要挾；而且更能把事变的責任强加在共产党方面，使无置辯的余地。但是終于逃不出有正义感的人們的明察，徒見其心劳日拙而已。

蔣介石于中山舰事变后，即大做其反共文章：除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的办法，和把在軍隊中任党政工作的共产党员一律清除出去之外，并以青年軍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組織有違亲爱精誠的校訓，破坏整个同学的团結，下令一律撤銷，不准阳奉阴違。

二、黃埔同学会的成立

蔣介石于撤銷两个組織后，他估計到共产党的学生决不会因青年軍人联合会的撤銷而中止其暗中的組織活动。他感到非有一个在其直接控制之下的統一的組織，不足以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因此，乃决定成立黃埔同学会（是黃埔陸軍軍官学校同学会的簡称）的組織，并派蔣先云、冷欣、賈伯濤、楊引之、余洒度及曾扩情等为筹备員。我們于四月中旬开始筹备，五月中旬就緒，借广州中山大学体育場开成立会，約有两百多位同学参加，由蔣介石出席主持。設会长一人，由蔣自任；設秘书和監察干事各一人，設組織、宣傳、总务三科，各科設科长一人，科員数人。秘书一职，由蔣先云提出以曾扩情充任，經多数通过。監察干事胡靜安、組織科长楊

引之、宣傳科長余洒度和總務科長李默庵，是由蔣介石指派的。

我之得以任黃埔同學會的秘書，是經過相當的曲折過程的。在中山艦事變後，二十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因系共產黨員被解職，由我以第三團黨代表的職位升充政治部主任。不到半個月，就被該師副師長林振雄向蔣介石告發，說我有包庇共產黨的情事，並指出包惠僧任內所任用的秘書丁默村是共產黨人，沒有解除他的職務。我未來得及申辯，就被撤去主任之職。我被撤職後，生活立即發生恐慌，急想另派工作，即向蔣介石寫了一份相當長的報告，辯明丁默村過去雖是共產黨員，但早已公開脫離；在中山艦事變後，又堅決表示與共產黨劃清界限，請派人徹查，如所報不實，願受嚴厲處分。不到三天，即接到蔣介石的秘書長邵力子先生奉蔣介石面諭的復示，派我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並主辦軍校刊行的某種刊物（名稱記不起了）。我還未到政治部辦公，又得到蔣介石的手令，改派我為黃埔同學會的籌備員。蔣先云在成立同學會的大會上，提出我任秘書，並得到多數的同意，我想這是由於我對任何方面的同學都無惡感的緣故。

胡靜安之得派為監察干事，是由於他常向蔣介石報告共產黨的活動情形，頗得蔣的歡心。楊引之之得派為組織科長是由於他在孫文主義學會時，有堅決反共的表現，頗為蔣介石所信任。余洒度以共產黨員而得被派為宣傳科長，是由於他是“血花劇社”的社員，演劇時曾獲得蔣介石的當眾表揚；同時，凡屬“血花劇社”社員，都由蔣介石直接領導，逢年過節，都齊集在他家中聚餐，關係比一般同學親切，而余對蔣亦表示特別尊重。李默庵之得派為總務科長，是由於他原是

共产党员，在中山舰事变后，直接向蒋介石声明脱离共产党，愿效忠于国民党，因此为蒋介石所看中。

三、黄埔同学会的活动情况

黄埔同学会规定，凡属黄埔军校学生，均为当然会员，由同学会负责登记考核之责。凡毕业同学的任免和升迁调补等，均须根据同学会的登记考核来决定。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之下，效忠于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不得有任何其他的组织活动，尤其不准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如有违反，应受严厉的处分，或以叛逆论处。这表明同学会不仅对所有同学有任用罢免之权，而且操有生杀予夺之权。此时虽没有明白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的法西斯独裁的政治纲领，而同学会在实质上却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建立了初步的基础。

此外，不仅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中有黄埔同学会的组织；即所谓杂牌军队中，只要有黄埔同学渗入，亦无不有同样的组织活动，并进而掌握军队中的党权。蒋介石自成立黄埔同学会后，即在中央党部成立一个“军人部”，自任部长，以同学会秘书兼军人部秘书，其主要职员如组织、宣传、总务各科科长，亦无不由黄埔同学充任。凡军队中的党部组织和党代表的委派，都要通过军人部的提请，才能作出决定。我所记得起的，如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党代表林祖涵、第八军的党代表刘文岛、第九军的党代表吕超、第十四军的党代表熊式辉等，都是军人部所提请委派的。

蔣介石于成立黃埔同學會和軍人部后，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出發到江西，指揮北伐的戰事。留在廣州的黃埔同學會經常受到共產黨員同學尤其是未畢業的第四期的共產黨員同學的種種責難。他們時常揭發隊上官長虐待學生和貪污不法情事，以及任第六十團團長的第一期同學李杲、駐在中山縣有壓迫農民和工人的情事等等，責備同學會坐視不理。他們還散發傳單，張貼標語，真是難以應付。我當時認為這是軍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有計劃的策動，特以書面密報蔣介石，派第三期同學陳超帶往江西面交。蔣介石接到我的報告后，頗為震怒，即向其侍從秘書蔣先雲說：“反對會擴情就等於反對我。北伐尚未成功，共產黨的黃埔學生即如此蠻不讲理，我還能干總司令嗎？離了我的領導，看你們共產黨的同學還會有什麼出息？”經蔣先雲婉言勸解，說同學們如小孩一樣，吵吵鬧鬧，情所難免；請平心靜氣，不要因小而失大，并表示願親自回到廣州進行調處，蔣才息怒。此事雖經蔣先雲回來調處，暫告平息；但蔣介石到了南京后，對共產黨員同學的殘酷鎮壓和對熊雄的殺害，在當時可能已經下定了決心。

一九二六年十月，武昌、南昌兩個戰略地點為國民革命軍相繼占領后，蔣介石即不遵照中央“以武漢為臨時的國都”的決定，特電請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由廣州北遷到南昌行使職權，便于直接的控制；并令黃埔同學會隨同遷來。武漢方面依法力爭，并促蔣介石隨同中央轉到武漢行使總司令職權。他才迫不得已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到武漢一行，并要我隨同前往，以便聯系在武漢方面的同學。我于到武漢的第二天晚上，在漢口市游藝場召集了兩百多個同學听蔣訓話。他訓

話的大意是：要全体同学服从領導，團結一致，完成北伐，为国民党效忠，才对得起孙总理在天之灵云云。

蒋介石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在宴会上受到了苏联顧問鮑罗廷的責备。他认为这是“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不到三天，即不告而去，仍回南昌。他临离武汉前，特派我前往沙市任国民革命軍独立十三师（师长曾述孔，四川人）党代表，以拉攏該师，免被共产党渗入。我以同乡的关系把曾述孔拉了过来。到了二月中旬，蒋介石觉察到該师有被唐生智軍解决的征兆，特电曾述孔轉告我速回南昌一行，另有任务。我离沙市不两天，即聞該师已被唐生智的师长何鍵派兵包圍繳械了。

与我到十三师的同时，蒋介石聞朱德委員長在四川万县的楊森軍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特派同学会組織科长楊引之前往进行破坏。到宁汉分裂时，楊从万县回南京复命，路經武汉，被工人糾查队查获枪决了。当时在四川的黃埔同学受蒋介石的指示，在成都提督街公园內，为楊建立了一个“烈士碑”。

一九二七年三月初間，在武汉方面的共产党同学，有酝酿反蔣的情事。蒋介石特派我前往調解，我特約所認識的共产党同学如叶德生、李鳴珂（均四川人）等数十人，劝以只有全体同学，一心一德地在校长領導之下，才能完成北伐的历史任务，才有光明的前途，否則各走一方，难免不演成自相殘杀、同归于尽的惨局云云。叶等答以我們之服从校长与否，不以个人的利害为轉移；只要校长大公无私，对共产党同学一視同仁，并貫徹三大政策的执行，坚决走革命的道路；不引用張靜江等那些老朽昏庸之輩，我們沒有不服从他的領導

的。末后推我写一封信給蔣介石，表达上述的意願，由我面交。后以情势的恶化未敢交他。

与上述情况的同时，邓演达（曾先后任黃埔軍校訓練部副主任和教育长，当时任国民革命軍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駐武昌）在武汉发表了一篇論文，对蔣介石的領導革命頗有異議，尤以对老朽昏庸如張靜江、吳稚暉之流奉为党国元老，参与国家大計，有严正的批評。蔣介石頗以为慮，特派我同同学会宣傳科长余洒度，于三月十七日晚間到武昌見邓演达，代表他欢迎邓任总司令部參謀长，企图消除邓对他的反对。我两人首先表达我們的意願，請邓与蔣同心协力地領導全体同学，为偉大的革命事业而奋斗，否則領導人各不相謀，黃埔同学就难免不分化成为各种各样的私人团体，爭权夺利，自相殘杀，有負孙总理創辦黃埔軍校的苦心，根本說不上担当革命的大业。然后代表蔣很誠懇地欢迎他任总司令部參謀长，为国家大計的决策人。邓表示：“对校长并无別意，惟照他那样地領導革命，永久不会成功，只有照我的主張貫徹三大政策的执行，与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陣容，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校长能做到这点，我仍当受他的領導，当与不当參謀长，无关輕重得失。”我两人請他写一封信給蔣介石，說明上述的情由。他說：“今已夜深了，可明日来取信。”我两人按时去取信，他辞以因病不見而作罢。不几日，为中山舰事变的周年，武汉到处发现反蔣标語，并聞將以蔣介石走狗的罪名逮捕我，我即潜离武汉而东走，余洒度已不知去向了。

我离武汉于三月底到达上海时，蔣介石已由南昌先到两天了，我把在武汉活动的情形报告他以后，他没有什么表示。

隨即派我持他的親筆信去蘇州見第二十一師師長嚴重（原屬鄧演達任粵軍團長時的營長，對鄧頗有信仰），要他將在該師工作的共產黨員，一律押解到上海，听候發落。我到蘇州還未來得及交信時，蔣又派其侍從副官宓熙乘專車來趕我回去，他說：“信不可交，交了也得收回。”他雖沒有說明追回信件的用意，但我已意識到：蔣已決定了正式撕毀革命的三大政策，對共產黨人作總的清算；在沒有正式發動、採取各方一致的行動時，不宜有臨時和個別的行動，以免引起共產黨人的預先防備，難收一網打盡之效。果然，到四月十二日那天，就在上海發動了對共產黨人的慘絕人寰的血腥屠殺。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血腥屠殺慘案後，即轉到南京，成立他獨裁統治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我於此時，遭到了第一期同學洪顯丞等的反對，說我反共不力，不足以任同學會的秘書，即撤去秘書之職，以第一期同學鄧悌接充。為了清除黃埔同學中的共產黨員和與共產黨有關連的同學，特在同學會內設一“紀律股”，以嗜殺成性的第三期同學劉伯龍任股長，以流氓成性的第一期同學王慧生、第五期同學柏良等任股員。他們有對共產黨同學和與共產黨有關的同學等執行逮捕、審訊、監禁和處以死刑之權。如對第一期同學顧濬，認為他在南昌任憲兵營長時，有出賣憲兵團與共產黨、几使其副團長關麟征險遭不測的罪名，公開押赴鷄鳴寺下的墳場上執行槍決；其他用嚴刑拷訊、秘密處死的人，頗不在少數。

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八月被迫下野時，把他所有的軍隊和有關的軍事機構等等，統交何應欽接領；獨黃埔同學會則交由住在上海的朱紹良指導，并令遷往杭州進行會務，派我重任秘書，主要的任務是：團結在職的同學，保持和發展力

量，以備蔣介石復職時的驅使，其次，收容當時的失業同學集中在杭州，施以軍事和政治的訓練，共收容了一千餘人，編成一個總隊，由賀衷寒任總隊長，主持訓練事宜。

蔣介石下野不幾天後，何應欽遷就桂系李、白兩人的主張，把蔣在台上時所成立的七個補充團一律下令撤銷，蔣聞之大罵同學會不号召補充團在職的同學加以抗拒；並說：“不得已時上山當土匪，也得把補充團保持下來。”

緊接着，何應欽又下令：駐在京滬一帶由黃埔同學帶領的軍隊一律開往江北，防堵孫傳芳軍再次渡江；余下的地帶，統交李、白的軍隊接防。同學會立即号召團長以上的同學在朱紹良家開會，表示拒絕；如再強迫，當採取必要的行動。卒迫使何的命令未能實現。

蔣介石于下野後不久，即去日本。臨行之前，因知張靜江、吳雅輝、蔡元培、李石曾等，尚為李宗仁、李濟深等所尊重，特囑使他們發表所謂“分治合作”的主張，以游說李等。其大意是：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廣西、廣東等九省劃作四個區域：以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歸蔣介石統治；以江西、福建兩省歸何應欽統治；以湖北、湖南、廣西三省歸李宗仁統治；以廣東一省歸李濟深統治。彼此各治一方，開誠合作，以完成北伐任務，達到國家的統一。張靜江等于蔣介石剛去日本後，即與李宗仁等函電往來，商討分治合作問題，並由李石曾親往兩李處作說客。到十一月初間，張等認為已得李等的同意，特函蔣介石（住日本日光），交由我帶往面交，請其立即回國，主持分治合作事宜，免日久變生。蔣見而大悅。隨即函復張等，內有“只要敬之聽我的說，可同我一起，不必分開”的幾句話，

并决于一周左右回国。交我立即带回面交張等。果不出一周左右，蔣即由日本回到上海，作重上舞台的准备。

蔣介石回国后，我即把黄埔同学会由杭州迁回南京。不两月辞去同学会秘书职务，改任中央軍校政治部主任。尽管我不再任同学会秘书，而蔣介石却仍然把我作为同学会的秘书那样来驅使。本来整个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都是为蔣介石服务的；但使用起来，总不如同学会里的人可以随心所欲而毫无顾虑。其具体的事例如下：

一九二八年十月，蔣介石为了賺取四川各軍首脑对他的拥戴，特派我到四川从事活动，其詳情，已在我写的《蔣介石两次派曾扩情到四川的意图》的資料中有所說明，茲不再贅。

約在一九二九年八月的时期，上海警察局（局长袁良）破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組織几处，逮捕了黄埔第一期同学張际春（与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长張际春同志不是一人）及其他共产党员如彭湃等多人。蔣介石想借此瓦解当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特派我到上海警察局，将張际春同学保釋出来，其余如彭湃等多人，一律令由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輝枪决了。

距上述事件不久以后，我认为：在安徽紅軍中，任軍长的第一期同学許继慎，有爭取回到蔣介石領導下的可能；我經蔣的特許，写了一封很短的文言信給許，开首写的是“继慎兄无恙”几个字，信中的大意說明：蔣介石之怀念他，有如父兄之怀念子弟一样；望幡然改图，回到南京，定将受到最为优厚的待遇云云。交由第六期同学钟俊設法派人送交，事被紅軍查获，将我的信，譯成白話，“继慎兄无恙”几字，

譯成爲“繼續哥哥好么”？並加以極爲尖銳的諷刺，登在當時的紅旗周報上。

蔣介石在對閻錫山、馮玉祥戰爭結束後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個“自新同學招待所”，並派我爲招待所主任，第六期同學曾述道爲招待所幹事，公開宣布：凡屬黃埔同學，無論參加過任何反蔣集團的活動，只要悔罪歸來，決不追究既往，並不迫使作任何交代，而且待遇從優。前後約半年時間，共招待了一百二十人左右，計：共產黨同學余灑度、陳烈、韓濬、廖宗澤等十人左右；參加“改組派”的同學郭仲容、陳遠溯等四十餘人；參加“擴大大會”的同學杜從戎、徐會之等四十餘人。此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蔣活動，因失業而生活困難，冒充改組派的同學，如吳興泗等十餘人。這些人，除杜從戎一人外，都派了相當的工作。蔣介石並分批召見了這些人，每召見一批，都由我陪同一起。他對共產黨同學頗爲客氣，毫不追問共產黨的活動情況，只問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狀況，望他們今後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對參加改組派和擴大大會同學，則以教訓的口吻說他們信仰不專，動搖不定，長此下去，決不會有好的下場。尤其對杜從戎，剛一見面，即破口大罵，說他忘恩負義，無耻之尤。並說“我收容你回來，是因為我打了勝仗；如打了敗仗，你不會承認我是校長，我也不承認你是學生；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幾乎是要動手打人的樣子。

茲就余灑度和杜從戎兩人的有關情況，再加以分別說明如下：

余灑度知道了設有“自新同學招待所”以後，本猶疑不敢來，特先寫信問我是否可以來？我答以：來與不來，我不能